

normal undergraduate," states Sibley's *Harvard* 6
unusual fines and only one large bill for book
later studied law at the Inner Temple in Lon
gene the Massachusetts Bay Colony, he el

译学新论丛书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pirates but was a controversial political figure. E
of his life, he was the colony's autocratic chief ju

Cotton, Nathaniel, and Samuel Mather—sor
Increase Mat
prodigies. Cotton, the best

文学翻译杂合研究

fifteen when he graduated in 1678; his brothers
at sixteen. Cotton excelled in ancient languages

韩子满 著

self during church sermons by taking notes in I
and no doubt as a child, he seems to have be
prig. "I am able with little study to write in sex
declared; "I feast myself with the sweets of all t
the more polite part of mankind ordinarily pr
over his study door was a warning to visitors: "
supported the Salem witch trials of 1692 and lat
self in the Collegiate School of Connecticut, w
Yale at his suggestion. Mather was offered Yale's
clined it; he wished to be president of Harvar
over, however, on three occasions. "The Corpor
able College do again . . . treat me with their c
nity," he wrote in 1724, after the third rebuff.

A more appealing prodigy was Truman Hen
1854. As a child in Royalton, Vermont, he receive
ity as a "lightning calculator" that he was invite
examined by a committee of the Amer
Sciences. At the behest of President Edward Ew

海译文出版社



译学新论丛书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文学翻译杂合研究

韩子满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翻译杂合研究/韩子满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10

(译学新论丛书)

ISBN 7-5327-3846-9

I. 文... II. 韩... III. 文学—翻译—研究
IV. 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5160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文学翻译杂合研究

韩子满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字数 182,000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100 册

ISBN 7-5327-3846-9/H·711

定价: 16.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总 序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长期以来翻译家本身专注于翻译实践,忽视了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

与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丰富的实践与贫乏的理论之间所产生的这道深深的裂痕却不能完全掩盖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而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翻译家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们对翻译理论思考的忽视,并不说明翻译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种种问题因为翻译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实上,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丰富实践,虽然对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以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去加以关注,但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手法、策略,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尤其是他们从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则,是一笔笔非常珍贵的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译事经验,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予以重视与关注,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无法发出其耀眼的光芒。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内、法国的乔治·穆南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数千年来一直处在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理论的思考、系统的分析与科学的探索范围。到了 70 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后,翻译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被历史尘封的一笔笔珍贵的翻译遗产。他们一方面追踪历史上的重大翻译事件,将翻译家的实践置于宽阔的历史空间加以认识与定位;另一方面伴随着翻译活动而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加以梳理与探讨。以现代学理对传统的翻译经验加以阐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深

化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翻译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说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边缘的话,那么正是借助现代学理,借助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从历史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

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如费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穆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翻译研究科学的性质,将过去近两千年来一直在经验层面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在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但翻译活动十分复杂,涉及的因素多,范围广,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得到辩证的解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不仅使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更为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探索空间。

当回过头去,对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所走过的路作以回顾性的审视时,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点:一是翻译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能达到的;二是翻译研究的途径得到不断开拓,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界的关注与承认。在国外,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起,就有学者开始对 50 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如加

拿大的罗贝尔·拉罗兹、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他们分别于1989年与1993年发表了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前者以翻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对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与思想进行评述;后者则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不同的观点和重要著作为依据,将当代的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五大流派。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收录了西方20位重要翻译理论家主要著作的部分章节的译文,这20位译学理论家中,除德莱顿、泰特勒、施莱尔马赫3位之外,其余17位均是当代的。根据编者的划分,西方译学研究界的这20位代表人物被列入6大学派: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除传统的语文学派,其余的5个流派都是近50年来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两位编者这样说道:“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如果再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一些,还可列举出符号学派、交际学派、语言哲学派、文艺学派等翻译流派。从历史上长期以来“不入流”的翻译经验之谈到20世纪末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流派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理论研究开始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透过这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以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产生的研究成果被统称为“语言学派”,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参照的研究,被冠以“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总之,一种理论的介入,从积极的角度讲,都会给人们认识与研究翻译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确实为翻译研究拓展了巨大的空

间,为翻译研究注入了科学的活力,渐渐地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但是,当各种学科的理论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当我们在为翻译研究由此进入全面发展而欣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此外,在理论的层面上,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还出现了“理论+翻译”的两张皮现象,有的理论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起到指导翻译研究的作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面对这一危险,我们不能不清醒地保持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从翻译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编的这套《译学新论丛书》正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

《译学新论丛书》有着明确的追求:一是入选的课题力求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但愿在翻译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们的追求能一步步得以实现。

主编

2005年9月18日于南京大学

总
序

目 录

绪论	杂合与文学翻译研究	/1
第一节	杂合概念的由来	/2
第二节	翻译研究中的杂合	/12
第三节	本书的意图	/19
第一章	文学翻译与原文杂合	/21
第一节	原文杂合的形式	/23
第二节	原文杂合对翻译的挑战	/25
第三节	原文杂合的翻译实践	/32
第四节	原文杂合翻译实践述评	/46
第二章	文学翻译与译文杂合	/55
第一节	译文杂合的表现	/57
第二节	译文杂合的普遍性	/61
第三节	译文杂合的其他例证	/76

目录

Contents

第三章 译文杂合的历史性	/85
第一节 译文杂合度的历史演变	/87
第二节 译文杂合影响因素的历史性	/102
第三节 译文杂合标准的历史性	/125
第四章 翻译杂合与翻译理论	/129
第一节 杂合与翻译任务	/131
第二节 杂合与翻译策略	/150
第三节 杂合与翻译标准	/161
第五章 翻译杂合与文化杂合	/185
第一节 文化杂合时代的文学翻译	/187
第二节 翻译杂合与中国文化	/193
 结论	 /203
参考文献	/207
后记	/231

绪论 杂合与文学翻译研究

本书讨论的“杂合”系由英语中 hybrid^① 一词翻译而来,表示由于两方或多方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新的一方。这个新的一方具有原来各方的一些特点,但也有一些新的特点,与原来各方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显著的区别。当前学术界,尤其是西方的学者们对杂合现象非常关注,因为在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都存在这种现象。

其实,在翻译领域,杂合现象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首先,由于语言文化的杂合性,或是作者的某种艺术追求,很多文学作品就是一个杂合体,综合了多种语言、文化^②的成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多语文本。这样,文学翻译所处理的原文有时候就是杂合的。这无疑对译者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其次,文学翻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杂合的过程。尽管有些译者力图使自己的译文完全不露翻译的痕迹,但译文还是会不可避免地保留

① 这个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汉译名目前还不统一,有“杂交”(博埃默,1998)、“杂种”(孙景尧等,1997:410)、“杂糅”(杜林,1999:85)、“混合”(刘纯豹,1997:866)等多种。但这几个译名的俚俗化特点都过于明显,有的还带有贬义色彩,不适合于作为科学术语。而“杂合”则比较正式,且不暗含任何感情色彩,适合于作为术语使用。

② 为了论述方便,本书使用的“文化”有两种含义。当与语言、文学并列来谈时,取其狭义,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等(《辞海》,4022),包括人们的宗教观念、风俗习惯等;单独来谈时则取其广义,既包括上面所说的狭义上的文化,也包括语言、文学等人类精神或物质方面的一切成果。

一些原语语言、文化、文学的成分。这些成分与译文中的译入语语言、文化、文学成分就形成了杂合,使译文成了不折不扣的杂合体。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不管译者如何努力,在翻译的时候仍然会受到来自原文的种种影响,并最终将这些影响表现在译文中。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这种杂合和其他学科中所讨论的杂合都是基本一致的。

在英语文学的汉译中,这两个环节的杂合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就原文杂合来说,英语文学中的许多文本都具有明显的杂合性,多语文本的数量也较多,在文学界影响很大,因而也时常出现在汉语译者的实践中;就译文杂合来说,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比较大,文化和文学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很难完全摆脱原文的影响,这样译文就必然会表现出英语语言、文化、文学的特点,从而具有了杂合性。

因此,把杂合概念引入到文学翻译研究,尤其是汉译英语文学的研究中来,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语言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都对各自领域中的杂合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一些翻译学者偶尔也提到了杂合的概念,研究文学翻译中的杂合现象已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不过,由于各学科中有关杂合的论述不尽相同,对于这一理论基础,还需要进行认真的梳理。

第一节

杂合概念的由来

“Hybrid”这个词在英语中使用的时间并不长。根据《牛津英语词典》

的记载,该词17世纪初才出现,在19世纪以前很少有人使用。(Simpson & Weiner, 1989:523)19世纪以后,这个词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不仅频频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用语中,而且还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许多领域,成为一些学科中的重要概念。先是主要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后来又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各学科之中。虽然这一概念在不同学科中的汉语翻译不尽相同,但其基本含义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就为我们确定文学翻译研究中“杂合”的含义提供了条件。

一、自然科学中的杂合

在自然科学中,hybrid一词首先被用于生物学,汉语中通行的翻译是“杂交”。作为名词,该词指“不同种、属的两种动物或植物的后代”(同上),也可以指人,即混血种人(mongrel, half-breed);作为形容词则指这种后代所具有的特点或性质,比如我们平常所说的杂交水稻、杂交小麦,或是杂交牛、羊等;在电子学中,hybrid则主要作为复合词的一部分出现,通行的译法为“混合”,如“混合线圈”(hybrid coil)、“混合计算机”(hybrid computer)、“混合电路”(hybrid circuit)等,表示这些装置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部件,或具有两种或多种不同的功能。如“混合计算机”指的就是“一种既能处理模拟数据也能处理数字数据的计算机”^①;在化学中,hybrid通常也被译为“混合”,也主要出现在复合词中,如“混合岩石”(hybrid rock),指的是“由两种岩浆混合或由于侵入岩的侵入而同化形成的岩石”(王同亿,1987:2545);其他自然科学的学科有时也使用hybrid这个词,但不如以上三个学科用得频繁,且较少用作固定的术语。虽然译法不一,但是不难看出,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在各学科中基本相同。

需要指出的是,在自然科学中,与原先各方相比,杂合通常会表现出

① 《英汉计算机词典》,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92,429页。

某种明显的优势。比如电子学中的那几种混合装置,就具有一般的装置所不具备的优点;在生物学中,也有所谓“杂合优势”(hybrid vigor)的说法,即与纯种的动植物相比,杂合的动植物往往会表现出明显的生长优势。因此,尽管一般来说杂合是个中性词,但有时也会具有明显的褒义。

二、语言学中的杂合

语言学是社会科学中较早使用“杂合”概念的学科之一。在语言学中,hybrid这个词主要用于两个概念。一个是通常所说的“hybrid word”,有的著作中也直接称为“hybrid”,指“由历史上源自不同语言的成分构成的单词”(Mathews, 1997:166)。如在“amoral”这个英语词中,“a”是否定前缀,来自希腊语,其余的成分则来自拉丁语;“automobile”的组成成分“auto”和“mobile”则分别来自希腊语中的“autos”和拉丁语中的“mobilis”。在英语等西方语言中,杂合词在新词汇中已经占到了相当高的比例,杂合已成为这些语言构造合成词的常用方法之一,对丰富这些语言的词汇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个概念是“hybrid language”。有的学者将之定义为“词汇中含有大量外来词的语言”(Pei and Gaynor, 1975:93),即在词汇方面与别的语言大规模杂合的语言。还有一些学者把这个概念等同于克里奥尔语(creole)或接触语(contact vernacular),(Pei, 1966:117)即由不同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杂合而成的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有时候只是在一些殖民地的港口等地方被商人们作临时之用,即洋泾浜语或接触语,有时候则逐渐发展成一个地方人们的母语,即克里奥尔语。

语言使用中的杂合现象曾遭到许多人的非议,如有的中国学者就把“洋泾浜”看作是“语言污染的‘顶峰’”(陈原,1980:53)。克里奥尔语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曾为人们所诟病。但是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语言的杂合也有许多优点,研究杂合的积极意义,并为杂合现象进行辩护。如有的学者就注意到,洋泾浜语

和克里奥尔语对社会稳定曾起过积极的作用,而且在表达能力方面也和其他语言相当。(Mühlhäusler, 1986:283, 28—29)虽然对于汉语这样相对成熟、历史悠久的语言来说,过多的杂合现象可能会引起混乱,但对于有些语言,尤其是殖民地或其他受到西方语言渗透的弱势文化的语言来说,杂合则是人们不得不作出的选择,而且杂合的词汇和语言也满足了人们表达的需要,丰富并发展了当地的语言。人们现在已能够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语言中的杂合现象了,把杂合看作是语言的某一种特性。只要语言中包容了来源不同的成分,就可以称作是杂合。如有人就把中古英语看作是杂合的语言,一种克里奥尔语。(Mathews, 1997:82)

三、文学理论中的杂合

在文学理论界,最早关注杂合问题的是从事现代主义文论研究的学者,其中又以巴赫金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最为充分。

巴赫金主要分析了文学作品中存在的杂合化(hybridization)的问题。所谓“杂合化”,指的是“单个语句界限之内、语句的范围之内两种社会语言的混合,两种被时代、社会差别或其他因素分开的不同的语言意识之间的混合”(Bakhtin, 1981:358)。具体来说,这种杂合又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比喻意义上的“语言”的杂合,即语句或文学作品中表面上的语意、话语方式与隐含的言外之意、话语方式之间的杂合。由这种杂合构成的“杂合结构”(hybrid construction)是“在语法[句法]和组成标记上属于一个单独的说话者,但实际上其内部却混合有两个语句、两种话语方式、两种‘语言’、两套语义及价值信仰系统的语句”(同上:304)。也就是说,这时的杂合实际上表现为同一说话人的话语、甚至同一个话语单位中多个不同的意识、信仰、意义的杂合。二是通常意义上的语言的杂合,即“两种语言的混合,两种不同的语言意识的相遇”(同上:358),也就是不同的民族语言之间相互混合交融而形成的杂合。

这两个层面上的杂合在文学作品中都有比较明显的反映,即巴赫金所说的“多语现象”。巴赫金认为,“文学不简单是对语言的运用,而是对语言的一种艺术认识,是语言的形象,是语言在艺术中的自我意识。语言的第三维”(巴赫金,1998:273)。换句话说,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照搬日常语言,而是要发掘语言丰富的内在意义和功能,使其表现出多样性和多层次性,由此就形成了上述第一个层面的杂合;巴赫金还注意到,在文学作品中,“外国语也能成为描写的对象”(同上:274)。因此,同一部文学作品就可能会混合使用多种不同的语言的成分,因而形成了上述第二个层面的杂合。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多语现象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长篇小说。正如巴赫金所言,“真正的积极的多语现象是长篇小说体裁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不过,这两个层面上的多语现象在长篇小说中的分布并不均衡。“严格意义上的多语现象(即超出民族语范围的多语)在长篇小说里是一种例外的情形。故意为之的修辞上的多语(多民族语)混合,在长篇小说中当然是极其罕见的。一般说来,长篇小说中的多语,最多也不过是该民族语的分化而已”(同上:127)。

在巴赫金看来,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文学作品中必然会出现这两个层面的杂合。根据他著名的语言杂多理论(heteroglossia),语言多样性和多层次性是文化的基本形态,在文化不稳定期或转型期尤为如此。到了现代,这种语言杂多的状况更是无处不在,因为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里,单调的民族语言无法回避地会感觉到被一片‘语言杂多的海洋’包围着”(Werbnier, 1997:6)。就文学语言来看,巴赫金认为,欧洲文学从史诗发展到小说,经历了一个从封闭的单语话语到开放的多语言交流与接触的过程。“现代小说再现的是……一个语言杂多的现代社会”。而且,文学作品中的这种杂合还是“文学的基本特性使然”(巴赫金,1998:276)。

巴赫金还认为,权威话语在本质上是“不可能产生双重声音的;不

能进入到杂合结构之中”(Bakhtin, 1981:344),因此杂合的形成也意味着对权威话语的挑战和反抗。由于杂合本身包含了许多原本各不相干的成分,因此杂合也是“生产力极强的;它们蕴含了产生新的世界观的潜能,蕴含有了新的用言语来感知世界的‘内部形式’”(同上:360)。而这往往是权威话语所无法掌控的。另外,杂合还可以“为语言带来深刻的批判态度”,“使其取得一种新的质”(同上:127),因而可以丰富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使其更有深度,也更有批判力。这两个方面就是杂合在文学作品中的积极意义。

后来,研究后殖民文学的学者们也对杂合问题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这些学者注意到,后殖民文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杂合。具体来说,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殖民地作家主要用当地语言创作的文学。由于殖民地的语言和文化在殖民运动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多数已丧失了其固有的特点,因此当地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往往有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通过写作来填补由于自身的母语及当地的文化退化或失落而留下的空间,因而他们就在自己的作品中“努力包容各个层面上不可避免的混杂性”(博埃默,1998:264)。这样,他们的作品中就会形成本土传统的语言文化与宗主国的语言文化的杂合,作品本身也成了杂合文本(hybrid text)。这样的作品可以实现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对于当地的土著读者来说,这种杂合的文本可以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文化之根”,让他们感受到,“过去依然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心中”(同上:265);另一方面,由于这样的文本主要采取“被殖民者的视角并赋予其权威的声音”(Madsen, 1999:6),即更多地从当地人的角度来进行文学创作,打破了欧洲人的文学观念。西方读者虽然可能会在这些作品中发现一些自己熟悉的成分,但却无法轻易地理解这些作品,因此西方的文学权威和殖民者们也无法控制这样的文学。这样杂合又成了被殖民者反抗殖民者的一种策略。